

子海精華編

主編 王承略 副主編 聶濟冬

讀書錄 讀書續錄

(明) 薛瑄 撰 孫浦桓 點校



鳳凰出版社

子海精華編

主編 王承略 副主編 聶濟冬

讀書錄 讀書續錄

(明)薛瑄 撰 孫浦桓 點校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讀書錄 讀書續錄 / (明) 薛瑄撰 ; 孫浦桓點校.
— 南京 : 鳳凰出版社, 2017. 10
(子海精華編 / 王承略主編)
ISBN 978-7-5506-2665-2

I. ①讀… II. ①薛… ②孫… III. ①讀書筆記—中國—明代 IV. ①G79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7)第245830號

書名	讀書錄 讀書續錄
著者	(明)薛瑄 撰 孫浦桓 點校
責任編輯	林日波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郵編:210009
出版社網址	http://www.fhcbs.com
照排	江蘇鳳凰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	南通印刷總廠有限公司 南通市通州經濟開發區朝霞路180號,郵編:226300
開本	890×1240毫米 1/32
印張	12.5
字數	270千字
版次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06-2665-2
定價	80.00圓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電話:0513-80237871)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子海》整理與研究”成果

山東省社科規劃重大委托項目成果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子海》整理與研究”成果之一

《子海精華編》

工作委員會

主 任：樊麗明 孫守剛

副 主 任：李建軍 胡金焱 張建康 周 斌

委 員（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 飛 王君松 王學典 方 輝 巴金文 邢占軍
杜 福 李平生 李劍峰 余江濤 孫鳳收 陳宏偉
劉丕平 劉洪渭

編纂委員會

學術顧問：安平秋 周勛初 葉國良 林慶彰 池田知久

總 編 纂：鄭傑文（首席專家） 王培源

副總編纂：王承略 劉心明

委 員（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 瑋 王 震 王小婷 王國良 李 梅 李士彪
李玉清 何 永 宋開玉 苗 菁 林日波 郝潤華
姜 濤 姜小青 馬慶洲 秦躍宇 高海安 陳元峰
黃懷信 張 兵 張曉生 單承彬 蔡先金 漆永祥
鄧駿捷 蘭 翠 竇秀豔

審稿專家：周立昇 鄭慶篤 王洲明 吳慶峰 林開甲 張崇琛

唐子恒 徐有富 晁岳佩

執行主編：王承略 聶濟冬

執行編纂(按姓氏筆畫排列):

王成厚 王 娜 尹思琦 曲娟娟 李 兵 宋恩來

苗 露 柏 雲 柳湘瑜 張雨霏 賈 兵 蘇運蕾

編 務: 張 櫻 劉 端 孫紅苑 沈 虎

本書審稿專家: 徐有富

《子海精華編》出版說明

“子海”，即“子書淵海”的簡稱。“《子海》整理與研究”課題係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山東省社科規劃重大委托項目。該課題分《珍本編》、《精華編》、《研究編》、《翻譯編》四個版塊，力圖把子部珍稀文獻、精華文獻進行深層次的整理、研究和譯介，挖掘子部文獻的價值，促進子學研究的發展。

山東大學向來以文史見長。古籍整理與子學研究，是其中的傳統研究方向。“《子海》整理與研究”，是在山東大學前輩學者高亨先生積 30 年之力陸續做成的《先秦諸子研究文獻目錄》的基礎上，由已故著名古籍整理與研究專家董治安先生參與策劃、設計的大型綜合研究課題。課題立項後，得到了中宣部、教育部、財政部、山東省政府和山東大學的大力支持，學界同仁踴躍參與。《精華編》的整理研究團隊近 200 人，來自海內外 48 所高校和研究機構。在組織管理上，《精華編》努力探索傳統文化研究協同創新的新體制、新機制，現已呈現出活力和實效。

華夏文明是由多元文化構築而成的。中國古代子部典籍，以歷代士人個性化作品的形式，系統性地展示了華夏民族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立體性地反映了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發展的貢獻。其中，無論是宏篇大論，還是叢殘小語，都激蕩

著歷史的聲音，閃爍著智慧的光芒，構成中國古代思想、藝術、科技和生活方式的主體內容。《精華編》通過對子部最優秀的典籍的整理，一方面擷英取粹，為華夏文明的傳播提供可靠的資源和文本；另一方面以古鑒今，為當下社會的發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撐。並希望進而梳理中華傳統文化的多元結構，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貫文脈。

根據漢代以後子學發展和子部典籍的實際情況，參照官私目錄的分類與著錄，《精華編》選取先秦諸子、儒學、兵家、法家、農家、醫家、曆算、術數、藝術、雜家、小說家、譜錄、釋道、類書等十四個類目的要籍幾百種，編為目錄，作為整理的依據，而在成果展現上則不出現具體的類目。為統一體例，便於工作，《精華編》編有詳細的《整理細則》，並有簡明的《整理要則》，供整理者遵循使用。

《精華編》整理原則是，對每種子書的整理，突出學術性、資料性和創新性，力求吸納已有的整理成果，推出更具參考價值、更方便閱讀的整理文本。所採用的整理方式，大體有三種：一、部頭較大且前人未曾整理者，採用標點、校勘的方式整理；二、前人曾經標點、校勘者，或採用抽換更好或別具學術特色底本的方式整理，或採用集校、集注的方式整理，或採用校箋、疏證的方式整理，或綜合使用以上方式；三、前人已有較好的注本者，則採用集注、彙評、補正等方式整理。

《精華編》採用五次校審、遞進推動的管理程式，即：一、初校全稿。子海編纂中心組織碩、博研究生，修改文稿錯別字，規範異體字，調整格式，發現並標明校點中的不妥之處。二、初審文稿。子海編纂中心的編纂人員根據情況，解決初校時發現的問題，並判斷書稿的整體質量。三、匿名評審。

聘請資深教授通審全稿，全面進行學術把關，消滅硬傷，寫出審稿意見。四、修改文稿。子海編纂中心及時把專家審稿意見反饋給整理者。整理者根據審稿意見修改，做出新文稿。五、終審文稿。待新文稿返回子海編纂中心後，總編纂作最後的學術質量把關。五步程序完成後，將文稿交付出版社。

五次校審的目的是爲了保證學術質量，提高整理水平，減少錯訛硬傷。但校書如掃塵埃落葉，隨掃隨有，《精華編》雖經多道程序嚴加把關，仍難免有錯，懇請方家不吝指教。子海編纂中心將及時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把工作做得更好，以實現課題設計的初衷。

整理說明

薛瑄(1389—1464)，字德溫，號敬軒，河津(今山西省河津市)人。他是明代著名的理學家，河東學派的創始人，世稱“薛河東”。官至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有《薛文清公全集》行世。《明史》卷二百八十二有傳。

薛瑄出生於儒學世家，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天資聰穎，勤奮苦學，在三十歲以前，無心參加科舉考試，而是埋頭研讀儒家經典，孜孜以求儒道之理。

永樂十八年(1420)，已屆而立之年的薛瑄奉父命參加河南鄉試(其時，薛貞在河南鄆陵縣任儒學教諭)，中解元。翌年，薛瑄赴京會試，進士及第。

薛瑄從宣德三年(1428)至天順元年(1457)這三十年間，居官從政的時間有二十四年。他經常做執掌法紀的官員，如監察御史、大理寺少卿和大理寺卿等。他嚴於律己，勤廉從政，有很好的聲譽。

天順元年(1457)春，將近七十歲的薛瑄升任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學士，入閣參與機務。但是，英宗皇帝平庸無能，薛瑄對曹吉祥、石亨亂政和于謙、王文被害之事深感失望，遂生退隱之志，很快便告老還鄉了。

薛瑄致仕還鄉以後，授徒講學，著書立說，使河東學派漸

臻隆盛。天順八年(1464)六月,薛瑄溘然長逝。次年,朝廷追贈薛瑄爲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謚號文清。隆慶五年(1571)九月,詔准薛瑄從祀孔廟。

《讀書錄》十一卷、《讀書續錄》十二卷(以下簡稱“兩《錄》”),是薛瑄平素讀書的筆記。薛瑄讀書的範圍,主要是先秦儒家的經典和宋代理學家的著述,偶及先秦道家著作和《史》、《漢》等經典史籍。黃宗羲《明儒學案》說:“(薛瑄)先生以復性爲宗,濂洛爲鵠,所著《讀書錄》大概爲《太極圖說》、《西銘》、《正蒙》之義疏,然多重複雜出,未經刪削,蓋惟體驗身心,非欲成書也。”^①“以復性爲宗,濂洛爲鵠”這個說法準確地概括了兩《錄》的學術宗旨,“重複雜出”云云,則一面指出兩《錄》成書的品質較爲粗糙,一面也解釋了這粗糙的原因是“蓋惟體驗身心,非欲成書也”。這都符合兩《錄》的實際情況。

從迄今所見最早的版本來看,作爲讀書筆記的兩《錄》,既無明確的主題分類,也無明確的時間記錄,似乎只是將一條條的讀書心得較爲隨意地集錄在一起罷了。但是,兩《錄》在思想上,卻並不隨意散漫。它由兩條思想主幹把全部筆記串聯起來,構成一部形散而神凝的理學著作。這兩條思想主幹,一是理氣統一論,一是理學實踐論。

首先,關於理氣統一論。

《讀書錄》開卷之首,薛瑄就明確說道:“無極而太極,非有二也。以無聲無臭而言,謂之無極。以極至之理而言,謂之太極。無聲無臭,而至理存焉。”在這裏,“無聲無臭”者,

^① 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七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21頁。

“氣”也，“無極”也；“極至之理”者，“理”也，“太極”也。“無聲無臭，而至理存焉”，“理”與“氣”相互依存，在存在上不分先後。這個理氣統一的學說，大致上是薛瑄在哲學本體論上的核心思想。

宋代儒家以“無極”、“太極”、“氣”、“理”諸概念構建了一幅宇宙圖式。由於尋本究源之心格外熱切、架構體系之舉格外宏闊，所以遺留下來的問題也就相對較多。理氣在存在上的先後問題就是一個例子。張岱年先生說：“朱熹雖然也講‘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但又說：‘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先有是理’；‘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①指出朱熹在理氣統一觀上的游移之處。薛瑄在這個問題上，彌合了宋代儒家的游移之論。他說：“理氣本不可分先後，但語其微顯，則若理在氣先。其實有則俱有，不可以先後論也。”（《讀書錄》）卷二）“理”、“氣”的存在是“理”“微”而“氣”“顯”，“微”的存在給了人錯覺，似乎它應該先有，然後生出“顯”的“氣”來。實際上，無中生有是不可能的，“有則俱有”，理氣“不可以先後論也”。爲了說明問題，薛瑄作了一段較爲細緻的論說：“或言：‘未有天地之先，畢竟先有此理。有此理便有此氣。’竊謂理氣不可分先後。蓋未有天地之先，天地之形雖未成，而所以爲天地之氣，則渾渾乎未嘗間斷止息，而理涵乎氣之中也。及動而生陽，而天始分，則理乘是氣之動而具於天之中；靜而生陰，而地始分，則理乘是氣之靜而具於地之中。分天分地，而理無不在；一動一靜，而理無不存。以至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

① 張岱年《〈薛瑄全集〉序》，《運城師專學報》1988年第2期。

窮，理氣二者蓋無須臾之相離也，又安可分孰先孰後哉？”（《讀書錄》卷三）這段解說，讓我們看到薛瑄對待理氣統一問題的認真態度及其對這一問題的嚴肅思考。“理涵乎氣之中”，有氣一定有理，有理一定有氣。薛瑄又以《太極圖》為例，進一步解釋說：“◎此圖中一小圈，即無極而太極。動而生陽，是右邊陰爲之根；靜而生陰，是左邊陽爲之根。方其動也，則太極附動而行；方其靜也，則太極依靜而立。陰陽相根，理氣混合，元無間斷、先後。”（《讀書錄》卷四）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因“理涵乎氣之中”，所以“陰陽相根，理氣混合”，“理”與“氣”既不會產生間斷，也不會分出先後。

薛瑄不僅彌合了宋儒在理氣問題上的游移之論，而且堅定地邁向氣本論。他說：“天地間只一氣，因有動靜，故有陰陽剛柔之分。”（《讀書續錄》卷一）世界是統一的，究其根底，它統一在“一氣”裏。動靜可以使氣有陰陽剛柔之分，但無論怎樣分，“氣”總是“氣”，而不可能是別的什麼東西。所以，薛瑄說：“一氣流行，一本也；著物，則各形各色而分殊矣。”（《讀書錄》卷三）必有一個根本的存在（“一本”）貫通於整個世界紛繁複雜的現象（“分殊”）中，這個世界才是一個多樣而統一的世界。這個貫通於整個世界的根本存在就是“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一氣也。”（《讀書續錄》卷四）當然，“理涵乎氣之中”，所以，“一氣一理，渾然無間。萬物各得一氣一理，分之則殊，合之則一”（《讀書續錄》卷一）。

薛瑄在理論上堅持氣本論，這個氣本論又是一個理氣統一論。這就繪出了一個理論上的前景：人生活在一個“一氣”貫通的世界裏，這個“一氣”又包涵著無論如何也擺不脫的“理”；所以“明理”也就成爲生人的自然且本然的一個任務

了。正如王健先生所指出的那樣：“薛瑄以氣本論改造朱熹的理先氣後說，並不是反對理存在的合理性。他的目的在於強調理氣‘無縫隙’的這種不可分的關係，只有如此，才能避免理氣脫節，使理不致成為‘氣之外懸空’之物，而是‘真實’的。”^①這樣的話，求道明理真的成了現實人生的一項真實任務了。

那麼，與“氣”俱在的“理”是什麼？如何求得此理、明瞭此理呢？薛瑄的回答是這樣的：“人之一身，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凡有形者，皆形而下之器也。其五臟、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之理，即形而上之道也。推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形而下之器也。其仁義禮智信之理，即形而上之道也。以至大而天地萬物，小如一髮一塵，凡可見者，皆形而下之器。其不可見者，皆形而上之道。然器即囿乎道之中，道不離乎器之外。”（《讀書錄》卷一）傳統的道器觀維護著理氣統一論，“仁義禮智信之理”這個“形而上之道”貫通在“人之一身”的“形而下之器”裏，“理”是什麼不就明明白白了嗎？如果對此還有疑問，那就請回顧一下孔子的名言：“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薛瑄解釋說：“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理也。人事，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類是也。天理，在人，如仁義禮智之性；在天，如元亨利貞之命是也。蓋下學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人事，便是上達仁義禮智、元亨利貞之天理也。”（《讀書錄》卷四）這樣，問題基本得到了解決，“元亨利貞”、“仁義禮智”都是“天理”，作為形而上的存在，它們包裹、貫徹了人的肉體生命，人需要做的就是“下學，學人事；

① 王健《中國明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0 頁。

上達，達天理”，即在整個人生實踐中，不斷地認識“元亨利貞”、“仁義禮智”的真實性和正確性。

其次，關於理學實踐論。

章學誠《文史通義》有一段很客觀的論說，講到性理的探求易入於空泛的玄思：“性命之說，易入虛無。朱子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雖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謂無失也。”^①薛瑄的理學，由於強調“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理”，所以能夠在很大程度上躲開“虛無”，而進入“實學”。

儒家的學問相較於道家、佛家的學說，本來就顯示出積極入世、重實有、輕空無的學術傾向，而薛瑄的“實學”則在此傾向上，加進了諸多的實踐因素，要求學者讀經應以實用為目的，不能將儒家經典當作“口耳文詞之資”。薛瑄說：“讀聖賢之書，句句字字見有的實用處，方為實學。若徒取以為口耳文詞之資，非實學也。”（《讀書續錄》卷三）這個“實用”、“實學”的思想，可以說是貫通在整個兩《錄》中，顯示了薛瑄理學的突出特徵。

薛瑄秉持循名責實、以實定名的名實觀。他說：“凡聖賢之書所載者，皆道理之名也。至於天地萬物所具者，皆道理之實也。書之謂某道某理，猶人之某名某姓也。有是人之姓名，則必實有是人。有是道理之名，則必實有是道理之實。學者當會於言意之表。”（《讀書錄》卷一）這不禁使人想到《論語·陽貨》裏孔子的名言：“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在禮樂的形式表現裏蘊含著禮樂的精神實

^① 葉瑛《文史通義校注》上冊，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264頁。

質。在“聖賢之書所載”的“道理之名”裏，也有一條指示意義的道路通向“道理之實”。“言意之表”這個說法，也使人聯想到莊子的“得意忘言”說。經由語言的提示，尋求意義的活動找到了自己的準確目的——這個目的已經不在語言的藩籬裏了。於是，在薛瑄的思想中，“言辭之末”的東西也只不過是一個“模寫”罷了，這個“模寫”所要指示的目的才是一個真實的存在。他說：“實理皆在乎萬物萬事之間，聖賢之書不過模寫其理耳。讀書而不知實理之所在，徒滯於言辭之末，夫何益之有？”（《讀書錄》卷十）由語言所表述的抽象之理，原本存在於真實世界的“萬物萬事之間”，它像一個實體一般真實得不能再真實了。通過聖賢之書的模寫，掌握這個實體般真實的“實理”，這是讀書的真實任務。薛瑄說：“天理如人。天理之名，如人之有名。既識人之名，須親見人之貌，方為真識其人。既知理之名，須真知理之實，方為真知其理。徒知理之名而不知理之實，猶徒識人之名而未嘗親見其人之貌，又烏為真知真識哉？”（《讀書錄》卷三）知道了一個人的名字，並不算真的認識了這個人，只有親見其人之容貌，方才算是認識了這個人。通過這個比喻，薛瑄強調了“天理”的真實存在，也暗示了一切表述“天理”的人為之作都具有某種相對性。

因此，實踐就成了特別重要的事情。他說：“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則事與理相安而皆有著落處。若見理雖明而不一一踐履過，則理與事不相資，終無可依據之地。”（《讀書錄》卷四）明理或不明理是重要的，但若明理之後，而不能實踐之，則理之明與事之違恰好構成認識論上的矛盾。若要解決這個矛盾，使“理與事相資”，將求知的主體安頓在“可依據

之地”，則“見得理明，須一一踐履過”，由實踐去檢驗、去固化所謂的“理明”，使“事與理相安而皆有著落處”，讓知行統一起來。所以，“不力行，只是學人說話”（《讀書錄》卷二），“致知力行，惟在於實，一有不實，則不能造其極矣”（《讀書錄》卷十），這些話都在強調實踐在“格物致知”、“明理盡性”活動中至為重要的地位。

在理氣統一論和理學實踐論之外，薛瑄的政治思想也是構成兩《錄》的一個重要內容。

在政治思想上，薛瑄推崇孟子的王道思想。薛瑄認為：“《孟子》一書，皆從仁義禮知中流出，所以為聖賢之言，所以為王者之道。”（《讀書續錄》卷三）在《讀書錄》卷六中，薛瑄指出：“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論王霸之分，莫切於此。”這裏，薛瑄找到了孟子劃分王霸之道的關鍵。王道是為政以德，實行仁政的。霸道相反，假借仁義，實行暴力統治。在《讀書續錄》卷三中，薛瑄指出：“所謂王者，真實愛民如子，《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以是施之，則民愛之如父母者，有必然矣。”執政者的內在真實仁心若能推廣充實到政治權力的諸環節中，便可形成王道。在《讀書續錄》卷四中，薛瑄對這一思想有進一步的論述：“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王道、仁政皆自此出。有一夫之不獲其所，聖人之心為之戚然不寧。”執政者需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仁心，天下不能有“一夫不獲其所”，否則執政者的仁心就要受到“戚然不寧”的折磨。

孔子“為政以德”的思想，是為建立政治的道德秩序，並試圖以此道德秩序去約束權力本身的泛濫。孟子繼承孔子